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富国与强军道路的探索及其启示

张亚斌

摘 要: 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中华民族富国强军的伟大梦想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60 多年间,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为实现富国与强军之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经历艰难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富国与强军之路。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为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历史启迪。

关 键 词: 新中国; 富国强军; 探索实践; 经验启示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4.12.003

富国与强军是近代中国百年追求的梦想,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这个梦想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为实现富国与强军之梦,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对富国与强军道路进行了孜孜不倦的艰辛探索。虽然客观情况复杂,缺乏经验,但在探索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深刻的教训。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党探索富国与强军的伟大实践,总结其经验,以史为鉴,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富国与强军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党探索富国与强军道路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的 60 多年间,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对富国与强军道路的探索前后经历了四个时期。

富国与强军相互交替时期(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初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严峻局势坚持富国与强军同时并举,相互交替,因时因地有所侧重。一方面,新中国刚刚成立,科技落后,财政困难,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尽快恢复国民经

济就成为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首要任务。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把“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确定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领导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尽快恢复与发展经济,1950 年 4 月,中共中央作出裁减军队 150 万员额,开始实施新中国首次大规模的裁军。之后又进行了三次大裁军,使军队数量从 627 万骤减到 237 万。这一时期,军队大规模裁减员额,有效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外交孤立,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就使得尽快建设强大的国防变得十分迫切,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中国边境,强军更成为燃眉之急。面对帝国主义武力威胁尤其是朝鲜战争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加大国防经费投入,积极地向国外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及时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出于作战急需,以欠下 30 亿元人民币的外债为代价,以半价赊购方式(只有少量属苏联无偿赠送)引进了苏联 106 个陆军师、23 个空军师的装备。1949 年至 1956 年的 7 年时间里,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为 35%。仅 1950 年军费支出就高达 45%。同时,全

作者简介:张亚斌,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大校军衔,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军事历史研究。(重庆 40003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富国与强军道路的实践研究”(14XDJ008)。

国各行各业向强军倾斜,向准备打仗聚焦,建设强大的国防成为头等大事和重中之重。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国际形势稍加缓和,出现短暂的喘息机会,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国防不可不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27-28}并形象地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比喻成“拳头”与“屁股”的关系,他说,屁股坐稳了,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酝酿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八大更明确地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向科学进军,向自然开战,大力发展生产力。“一五”计划顺利实施后,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人民生活亦有显著改善,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了初步基础。

强军优先于富国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随着冷战加剧,中苏关系恶化,台海局势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和越南战争爆发,台湾当局策划“反攻大陆”,加紧对东南沿海地区武装袭扰,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极其严峻。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战争一触即发、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党中央在处理“富国”与“强军”的关系时,逐渐把重心向“强军”倾斜,开始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国家资源较多地投入到了国防建设,国防建设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经济建设服从与服务于国防建设。这个时期,为了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党中央提出了“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出发,把国防放在第一位”的战略思想。这个时期国防开支大幅度增加,1965年国防费支出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20%。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扩军备战,加强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军队两次扩编,军队总员额长期保持在600万人以上,大规模国防建设的投入,对我国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强军服从和服务于富国时期(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分析国际总体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明确提出时代主题已由战争革命转向和平发展,对党的富国与强军战

略作出重要调整。邓小平强调要利用当前国际形势缓和的有利时机,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国家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3]他明确要求“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还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4]99}为了军队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邓小平强调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防和军队技术装备,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他指出:“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4]21}这个时期,为适应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军队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工程建设,开放部分机场、码头、仓库、铁路军事专用线等军用设施,军工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项目1.5万多项,帮助地方培养各类科技人才100多万人,减轻了国家财政压力,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向和平建设转轨与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了裁军100万的战略决策,并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进行了编制体制调整改革。

富国与强军协调统筹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20世纪90年代,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先后爆发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撞机等事件。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趋于紧张,台湾、西藏、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猖獗,“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活动蔓延,“东突”等恐怖势力威胁日益严重等。同时,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得到增强,为强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科学论断。江泽民指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必须形成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5]274}按照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不仅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设强大国防,而且也要在国防建设的过程中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两大建设的连接点则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战斗力,利用科学技术,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全面提高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科技含量,依靠科技进步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江泽民深刻指出“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应该相互兼容、相互促进。”^{[5]268}随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思想。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富国与强军的辩证关系做出的新的概括,他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6]38}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最重要的是坚持实行军民融合,“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7]41}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他进一步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8]43}。这就进一步明确了要把国防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协调发展。

中国共产党经过了60多年的艰辛探索,经历了多次选择,反复比较,付出了代价,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富国与强军正确道路,也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实力与国防实力同步增长,通过积极主动的战略筹划,把国防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相互促进、融为一体,努力形成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科学机制。

二 党探索富国与强军道路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富国与强军道路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艰难地探索,在曲折探索的实践中既取得过成就、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有过失误与教训。

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9]103}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这“两件大事”,努力把这“两件大事”统一于实践中。探索实践告诉我们,强军离不开富国,没有富国,不可能强军,富国是强军的依托,是强军的源泉与后盾,富国对强军具有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作为经济力量的竞赛,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较量。马克思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资的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10]17}同时,富国离不开强军,没有强军,富国也就会失去安全保障。马克思主义认为,军人“虽不生产谷物”,却能“生产安全”。强大的军队不仅能够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免遭侵略、为国家富强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而且也能有效地保卫不断拓展与延伸的国家利益。富国与强军两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枯荣与共,共生共长,富国与强军相统一体现了国家民族兴衰的普遍规律,这已经被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经济占当时世界经济的28%左右,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高于欧洲各国的总和,但在鸦片战争中,在区区几千名英兵的进攻下,一败涂地。鸦片战争之后大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落后要挨打,富而不强,也照样挨打。因此,必须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只有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坚持发展与实际可能相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富国与强军道路的某个历史阶段,基于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心理,大干快上,急于求成,盲目攀比,提出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过于强调发展速度,脱离国情,结果欲速则不达。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我国一度过分高估战争威胁,要求全民备战,强军在较长时期内优先于富国,军队员额和国防经费再度膨胀起来,军队数量逐步攀升至660余万,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达到26.1%,虽然国防威慑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也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国防建设最终因缺乏有力经济支撑而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则一度过分强调经济建设而要求军队忍耐,强军在较长时期内服从和服务于富国,造成军队武器装备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一些发展利益得不到有效安全保障。这说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无论是国防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必须立足于国情,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把发展与可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要根据条件改善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进行调整。离

开了国防建设,单纯搞经济建设,或是孤军深入,把国防建设摆在不适当的地位,都会给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坚持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富国与强军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人民群众来说,这种切身利益又区分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富国能够使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到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而强军需要财政大量地投入,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地投入,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力的提高,保持强军的威慑力量,能够使人民群众长期过着和平生活,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关乎着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一个国家财政支出总是有限的,如果过于注重现实利益或眼前利益,国防经费投入过低,势必影响最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影响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军事人才的培养,影响军队战斗力提高,拉大与发达国家军队之间的差距,国家安全就难以保证。如果国防经费投入过高,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过多地强调长远利益,忽视现实利益或眼前利益,甚至牺牲眼前利益换取长远利益,不仅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会影响教育科技和整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在相对和平时期,要科学统筹富国与强军的关系,就必须正确处理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既要注重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使人民群众直接享受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也要注重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消除国家安全隐患和后顾之忧,科学地把握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将两者统一于富国与强军的实践中。

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学习借鉴相统一。我国地域广阔,边海防线漫长,资源有限,人口负担重,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富国,还是强军都必须建立在依靠自己力量基础上,充分发挥本国人民的智慧,利用本国的资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既是我们富国与强军的出发点,也是立脚点。但不能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建设,要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善于把依靠本国力量与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技术经验有机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来,党在探索富国与强军的不同历史时期,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关起门来搞建设,几乎与世隔绝,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比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科技

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错失良机,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力和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到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而198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占日本的1/4。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这方面的教训,实施工作重点转移,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国外的有益经验,注重把国外经验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时,军队也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在探索走独立自主精兵之路的基础上,积极走出国门,参与对外交流合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军有力配合国家对外工作全局,同数十个国家进行了数百次专业技术团组交流,扩大与外军互派军事留学生规模,派团或观察员观摩外军训练演习,与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交往关系,与十几个国家建立了安全防务磋商机制,参与双边或多边战略磋商、联合演习。我军在积极与外军交流合作中不断地推进自身的建设与发展。

三 党探索富国与强军道路的深刻启示

必须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富国与强军道路的选择同党能否正确地判断国际形势有着直接的关联。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是科学把握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前提。由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准确把握和做出科学判断。新中国成立60多年间,党在探索富国与强军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有时能够正确地判断国际形势,有时对国际形势判断发生严重失误。当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时,就能够选择一条适合国情的富国与强军道路。当对国际形势判断出现严重失误时,就会选择背离国情的富国与强军道路。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对当时引发世界战争的根源缺乏深刻的分析,对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形势估计的过分严重,过于强调强军,国防投入过多,片面强调与强军有密切关系的重工业的发展,出现全国上下举国迎敌的局面,对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严重不利影响。20世纪80年代,党科学预测冷战结束后世界主题发生变化,准确判断和平发展世界主题,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军队建设转移到和平建设发展的轨道,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科学分析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认为整个

世界形势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依据国际形势的特点,确立增强经济实力和建设强大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项战略任务,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不可偏废。历史充分证明,正确选择富国与强军道路,必须善于着眼国际形势特点,从宏观的视角,高瞻远瞩,抓住主要矛盾,审时度势,分析和预测国际形势发展的总体趋势,在科学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确定适合国情的富国与强军发展道路。

必须站在全局高度抓好统筹。富国与强军的关系本质上是国家安全与发展问题。因此,必须站在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抓好统筹,宏观规划,整体布局。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间,党在探索富国与强军道路的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发展阶段没有科学地把握富国与强军的内在联系,未能统筹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在突出经济建设时,往往没有考虑到国防建设的需要。在强调国防建设时,片面地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挤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顾此失彼,不仅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比例严重失调,也直接迟滞了国防建设发展速度。因此,协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必须提升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统筹能力,搞好顶层设计,要在国家层面建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专门委员会、国防动员委员会、军队保障社会化领导小组等军地联席会议协调机制,并促使其常态化运行。同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要制定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重点专项规划,明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统筹的主要任务,将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体系,将武器装备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体系,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相互协调。

必须实行军民融合式发展。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是两种部门生产体系,但他们不是彼此孤立的,两种部门的产品和资源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资源,取得良好的经济与军事效益。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间,党在探索富国与强军道路的实践中,在某些发展时期,曾经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使军用产品与民用产品长期处于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状态,军民之间信息交流少,军工企业不能及时地了解民用需求,军用技术不能及时开发民用,产生民用效益。同样,民用企业不

解军用需求,不能将民用技术转化为军用需求,产生军事效益。军地之间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造成了大量资源重复配置和低效率,资源严重浪费。走富国与强军之路,必须依据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原则,打破现有的军工行业垄断,使民用企业进入军工行业,实现从独立、封闭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寓军于民的发展模式转变。通过“融合式”发展,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建立一个张弛有度、富有弹性的平战转换机制,提高国防系统分享经济建设成果的能力,依据市场配置资源,促进人才、技术、资金各个领域全面融合,实现民用与军用资源相互共享。比如,可以通过军民两用技术和两用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促使民用高科技成果转为军用;借助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推进军队的信息化建设;依托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取消军队办社会的负担,逐步建立军队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体系、物资储备体系、干部住房医疗保障体系、家属就业保障体系和子女教育保障体系。将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文集(7)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邓小平文选(3)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王睿峰. 邓小平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及时代价值探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 [4]邓小平文选(2)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江泽民文选(2)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6]胡锦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8]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毛泽东军事文集(6) [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0]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1) [M]. 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李建华)